

G 专家论坛

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 詹石窗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其略云:行属于火,谓之差者,立春节……当然,《太玄经》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月正”问题,史上有不同描述。汉代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疏的《尚书注疏》卷三记载了三国时期王肃的看法:“殷周改正,易民视听,自夏已上,皆以建寅为正。”意思是讲,殷、周改了历法,只是为了让人们一新耳目,其实在夏朝以前都以正月建寅。王肃所谓夏朝以前,到底可以推到什么时候?孔颖达等经学家们推到了尧舜;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言:黄帝乃“顺天地之纪”,《史记四时》进一步说“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根据《尚书·洪范》的解释,“历数”就是历法,具体而言即推算岁时节气的次序。如何推算?从现有史料看,也就是通过天干、地支的组合,来标识年月日时。张守节《史记正义》尚称,“黄帝受神筮,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由此可见,以天干、地支为组合元素的历法模式产生于黄帝时代是有案可稽的。既然如此,也就有了每年的“元旦”或“岁旦”。尽管今天我们难于知晓黄帝时期如何命名岁首,但那个时代创造的历法模式却为后来的春节礼俗奠定了基础。

G 项目成果

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成就与价值

□ 谢 辉

在易学史上,元代常被看作一个成就寥寥的时期,学者常以“株守宋儒”一语概括之。诚然,如从传统的象数、义理二途而言,元人确实未能突破宋儒藩篱。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朱子易学诞生于南宋后期,正是在元代才走上了全面繁荣与飞跃式发展之路,这也是元代易学有别于前代的最大特征。

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兴盛并非偶然。一方面,朱子《易本义》《易学启蒙》等著作成书后,随即在南宋广泛刊刻。学者多有传习,探讨其易学者,士人应举时也开始采用其说,《易学启蒙小传》《朱文公易说》等一批研究朱子易学的专著亦应运而生。可以说,研究朱子易学的热潮,在南宋后期就已初露端倪。元人正承继其后,进一步将其推向高峰。一方面,元朝政府尊崇程朱理学,特别是在科举考试中,明确规定《易》以程朱之说为主,由此给朱子易学增添了浓厚的官方学术色彩,也促进了其传播与发展。

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首要成就在于对朱子易学著作的注释和阐发,其中又尤以胡方平、胡一桂父子影响较大。胡方平师从黄榦弟子董梦程,乃朱学正传。所著《易学启蒙通释》,为现存第一部注释《易学启蒙》之作。其书以胡氏已说结合朱子论《易》文字,并引朱子门人九家之语,对《启蒙》进行疏释,总体以尊朱为主,但也有在朱子基础上推行发展者。胡一桂易学得自家传,所著有《易本义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春节向来颇受关注,关于它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有的描述其过程,有的介绍其礼仪,有的探讨其影响,角度不同,内容多样。这些都为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春节扩展了视野、提供了帮助。然而,春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如何演变的?我们应如何把握其文化精神?这些问题仍然有待深入探讨。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映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酒。

以上这段话主要讲了三件事:第一,在立春时节,天子亲自率领朝廷要员,到京畿东郊去举行“迎春”祭典。东郊祭祀完毕,天子赏赐参加祭祀典的官员,发布蕴含阳德与柔和精神的指令,广泛布施,惠及百姓。第二,诏命太史官保管好文献经籍,制定历法。要求太史官仰观天象,明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使历法的制定准确无误,让星象位置与运

行周期的记录成为往后的遵循。第三,在正月元日,举行开春的“籍田”典礼。其目的是祈求上天赐予五谷丰登。“籍田”仪式之后,天子率众回到太寝祖庙,赐酒予众官,开怀畅饮。从其叙述的语境来看,立春可能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元日,朝廷举行了一系列的典礼活动。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板”“门神”等。唐代的韩偓撰《四时纂要》卷一也有类似记载,其中所谓“爆竹”,首和精神的指令,广泛布施,惠及百姓。第二,诏命太史官保管好文献经籍,制定历法。要求太史官仰观天象,明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使历法的制定准确无误,让星象位置与运

感谢。远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

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道教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过年前的“送灶神”、过年后的“迎灶神”“接财神”、正月初九的“天公节”,以及正月十五的“元宵节”都有着道教文化烙印。汉代以来的“灶神”,被道教奉为“司命灶君”,主管着家家户户的户籍,攸关生死存亡;道教的玉皇大帝成为正月初九“天公节”仪式中的主要祭拜对象;作为春节仪式尾声的“元宵节”同时也是道教祭拜“三官大帝”的上元节。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结合。《周易会通》致力于对程朱易说的全面收集、合编与注释。其体例亦采用“纂疏体”,《周易》经文下列程《传》、《本义》之“集解”,程朱语录之“附录”,前代诸家之“纂注”。引录者多达一百九十五家,为当时规模最大的集解类易学著作。在经传编排方面,《周易会通》采取总体经传合一、每卦下经说分列的方式,有折衷程朱二家《周易》文本之意,为其一大特色。作为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周易会通》以程朱为核心,汇编了大量易学资料,明代《周易传义大全》即在其基础上纂修而成。

此外,学界一般认为,朱子之涵泳、玩味《诗经》,是为了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在对《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等文集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朱子所说的涵泳、玩味《诗经》,并不是独指要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主要是指仔细研读《诗经》文本,并借以体会其中所蕴含的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又,通过全面考察朱子诗经学,我们可以知道,朱子的诗经学并非为“疑经”,而只是怀疑前儒附加在经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和解释。也就是说,朱子疑的是汉儒的《毛诗》文本和后儒的《毛诗》传本,并没有质疑《诗经》本身;朱子疑的是汉唐诸儒的经解,即《毛传》《郑笺》和《孔疏》等,并不是《诗经》的经典本身。

除了对诗经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外,朱子在治《诗》实践中,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治《诗》的最终成果,就是

此外,学界一般认为,朱子之涵泳、玩味《诗经》,并不是独指要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主要是指仔细研读《诗经》文本,并借以体会其中所蕴含的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又,通过全面考察朱子诗经学,我们可以知道,朱子的诗经学并非为“疑经”,而只是怀疑前儒附加在经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和解释。也就是说,朱子疑的是汉儒的《毛诗》文本和后儒的《毛诗》传本,并没有质疑《诗经》本身;朱子疑的是汉唐诸儒的经解,即《毛传》《郑笺》和《孔疏》等,并不是《诗经》的经典本身。

除了对诗经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外,朱子在治《诗》实践中,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治《诗》的最终成果,就是

此外,学界一般认为,朱子之涵泳、玩味《诗经》,是为了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在对《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等文集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朱子所说的涵泳、玩味《诗经》,并不是独指要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主要是指仔细研读《诗经》文本,并借以体会其中所蕴含的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又,通过全面考察朱子诗经学,我们可以知道,朱子的诗经学并非为“疑经”,而只是怀疑前儒附加在经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和解释。也就是说,朱子疑的是汉儒的《毛诗》文本和后儒的《毛诗》传本,并没有质疑《诗经》本身;朱子疑的是汉唐诸儒的经解,即《毛传》《郑笺》和《孔疏》等,并不是《诗经》的经典本身。

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包括动物、植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作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自上古所形成的祭祀礼俗,伴随着先民们的自我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遗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道家与道教研究著作提要集成”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授）

G 研究心得

宋代时期,文化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诗经学研究逐渐突破汉代诗经学束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南宋中期的朱子是在诗经学理论和注解《诗经》两个方面皆有所创获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于《诗经》演进历程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在审视历代诗经学者长处与不足的基础上自成一派,既上承汉代诗经学,又下启清代诗经学,还影响着现代诗经学。

朱子在诗经学研究方面较之前宋儒走得更远,真正突破了汉代诗经学的束缚。他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对汉代诗经和宋代诗经学中合理部分加以吸收、为己所用;对不足之处则加以批评、为己镜鉴。这与他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正相契合:汉儒长于训诂,于格物有助;宋儒长于义理,于穷理有益。同时,他亦能不断反思自己旧说之弊,最终去《小序》以言《诗经》,撰成今本《诗集传》并不加以修正。正是在这个扬弃过程中,朱子在义理的统摄下兼重训诂,合汉、宋之长加以综合而弥补其不足,使其自己的诗经学得以形成。

朱子以绍承孔孟道统为己任,以格物穷理为方法论原则来构建诗经学,重点体现在诗经学理论和治《诗》实践两个方面。

朱子在诗经学理论方面所获尤多,这与其治《诗》理念息息相关。他的治《诗》宗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破除汉代诗经权威,试图回归圣贤本意;二是通承群言,加以熔铸综合后成为新篇,以揭示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三是指导人为学,以便于学者切己体察。朱子于治《诗》,首先以《诗》为“经”,其次才兼顾其中的文学特色。朱子的治《诗》原则,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严别经传,以《诗》言《诗》;二是由训诂以求义理,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三是简洁;四是多闻阙疑。

南宋时期,先秦时期的《诗经》古本早已不见,西汉初期的《三家诗》传本在当时也已亡佚,朱子所见到的完整《诗经》文本只有《毛诗》。朱子力图突破《毛诗》以治《诗经》,因此他对《毛诗》进行了系统的校勘。其校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校勘《毛诗》异文,二是勘正《毛诗》文本讹误,三是对《毛诗》分章断句重新认定,四是调整《毛诗》篇次。这也是朱子诗经学并非“《毛诗》学”的明证,他欲突破《毛诗》学以创新诗经学的苦心孤诣,于此也可窥见一斑。

朱子治《诗》,重其音韵。这主要反映在《诗集传》中用“叶音”的方式给韵脚字注音。受宋代音韵学发展的影响,朱子发展了“叶音”说。尽管朱子对于音韵理论认识尚有不足,但是对《毛诗》韵例的考察颇有成就。无论是在用韵方式上还是在韵脚位置上的考察认定,今人王力、王显、郭晋稀等先生的归纳在很大程度上与朱子的结论相同或相近,这是我们在研究朱子诗经学的理论预设和话语体系。朱子沿袭了前人去除《小序》的做法,而走得更远。“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故而不能与“经”等而视之,只能属于“传”。这样去除《小序》以言《诗》,也就有了理论基础。由此亦可见,朱子去《小序》以言《诗》的目的是为了回归原典,从《诗经》文本入手来理解《诗》意,不“先自立说”,以确保从中发掘出来的圣贤本意的可信性与有效性。而朱子在“去《序》”后,能最终完成创新诗经学的任务,这也使得他与之前的虞《序》者,如欧阳修、郑樵等,有着本质区别。

此外,学界一般认为,朱子之涵泳、玩味《诗经》,是为了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在对《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等文集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朱子所说的涵泳、玩味《诗经》,并不是独指要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主要是指仔细研读《诗经》文本,并借以体会其中所蕴含的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又,通过全面考察朱子诗经学,我们可以知道,朱子的诗经学并非为“疑经”,而只是怀疑前儒附加在经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和解释。也就是说,朱子疑的是汉儒的《毛诗》文本和后儒的《毛诗》传本,并没有质疑《诗经》本身;朱子疑的是汉唐诸儒的经解,即《毛传》《郑笺》和《孔疏》等,并不是《诗经》的经典本身。

除了对诗经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外,朱子在治《诗》实践中,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治《诗》的最终成果,就是

此外,学界一般认为,朱子之涵泳、玩味《诗经》,是为了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在对《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等文集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朱子所说的涵泳、玩味《诗经》,并不是独指要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主要是指仔细研读《诗经》文本,并借以体会其中所蕴含的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又,通过全面考察朱子诗经学,我们可以知道,朱子的诗经学并非为“疑经”,而只是怀疑前儒附加在经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和解释。也就是说,朱子疑的是汉儒的《毛诗》文本和后儒的《毛诗》传本,并没有质疑《诗经》本身;朱子疑的是汉唐诸儒的经解,即《毛传》《郑笺》和《孔疏》等,并不是《诗经》的经典本身。

除了对诗经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外,朱子在治《诗》实践中,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治《诗》的最终成果,就是

革故鼎

朱子诗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

陈才